

抗爭行爲的集體行動邏輯： 「反貪倒扁運動」之理性選擇分析*

王鼎銘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

抗爭與投票不同，屬一種非典型的政治行爲，本文歸納三種解釋這類行爲的動機：怨懟理論、資源動員理論與理性選擇理論。透過計數資料統計分析，關於 2006 年民眾參與反貪倒扁運動有幾點發現：一、無法以傳統政治行爲的角度來詮釋這項運動，特別是需要動員上街頭的抗爭，族群意識、省籍情結、乃至政黨認同皆難以發揮傳統的影響力。二、各理論僅理性選擇成功詮釋倒扁抗爭，並勾透出這種集體行動中的特殊公共財屬性。三、倒扁運動實際能產生巨大能量，主要得歸功百元捐款活動的規劃，它降低高風險高成本的抗爭本質，並減少了支持者搭便車的情況。

關鍵字：反貪倒扁運動、抗爭行爲、公共財、搭便車、計數資料模型

壹、前言

跟投票行爲一樣，抗爭或示威抗議 (protest) 也是民主社會裡民眾參與政治、表達訴求的一種形式，Boschken (1975) 指走進投票所投票跟上街頭參加抗議是可以並行不悖的，對一般人來說兩者並非完全互斥的選項。不過回顧既有的學術文獻，不難發現抗爭在形式上或是學理上都與傳統政治行爲迥異，特別是抗議行爲不似投票行爲般單純，常呈現非常多樣化的面貌與複雜

* 非常感謝集刊編委會與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悉心指正，所提寶貴意見讓文章修改更趨完善，惟文責當由作者自負。

性，更增添論述及研究上的困難。也因為兩者具備截然不同的特質與屬性，抗爭在相關研究中被視為一種非傳統或非典型的政治行爲（unconventional or unorthodox political action）（Kritzer, 1979: 109）。

關於抗爭行動的意涵，Kritzer（1979）特別強調暴力（violence）與非暴力（non-violence）兩種型態的抗爭，與之後 Bean（1991）以手段激烈程度簡單區分出低階抗爭（lower-level protest）與激進抗爭（radical protest）相仿；但更深入且明確的歸納，可根據 Barnes et al.（1979）對抗爭的四種漸進式分類來做觀察：第一級為完全合法的抗爭，包括簽屬請願書（petition）、參加合法集會等，可視為介於傳統與非傳統之間的政治行爲；第二級則是屬於半合法（semi-legal）的行動，以聯合抵制（boycott）等行爲為代表；第三與第四級均涉及非法行爲，只是第三級歸類為非暴力階段，包括非法集會、和平佔領等行動均屬之；第四級則是意圖造成身體傷害的暴力行爲，他們認為此時才完全逾越民主社會所容許的範疇，屬於造反、叛亂（rebellion）的層次。由此可見，抗爭的面向相當多元與複雜，實非單純的傳統政治參與模式可以比擬，也使得在實證研究裡要對抗爭行爲進行測量，遠比對傳統政治行爲困難得多（Dalton et al., 2010: 60）。

或許肇因於這種測量上的困難，即使臺灣發生各類抗爭事件的頻率比起選舉活動毫不遜色，但兩者在學術上所受到的青睞程度落差甚大，也使得這種非典型政治行爲的研究仍有許多進步的空間。究此，本文試圖透過 2006 年下旬風起雲湧的「反貪倒扁運動」，嘗試解構民眾參與這次抗爭運動的箇中緣由。從研究方法的角度來說，是項活動提供一個絕佳研究場域可歸納出三點理由：

首先，目前國內鳳毛麟角般的抗爭研究仍是從傳統政治行爲的觀點切入，忽略了長期以來國外相關文獻提出的主要論點，因此解釋力上恐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抗爭做為一種高風險、高成本的政治參與模式，國外相關研究多透過理性選擇理論，環繞在解釋參與者為何願甘冒風險，而不想當個搭便車的人（free rider），可惜這個面向在既有倒扁運動的討論中也付之闕如。其次，誠如 Javeline（2003）的研究所示，許多政治抗爭活動無法組織成功的一項重要原因，是民怨抒發的咎責（blame）對象不容易確定，此時若

執意賦予參與者在動機與行爲上的意義，更不免有失偏頗。因此對研究人員而言，抗爭目標與行動間的一致性與關聯性，對正確詮釋該活動內容相當重要，而這場倒扁運動的針對性與目的性都相當明確，使得活動成員參與誘因的因果論述不會受到太大挑戰。第三點理由是基於資料取得之便，由於一般抗爭活動的時間、範圍均不固定，如何取得適當的調查資料一直是相關研究的限制（Finkel and Muller, 1998: 37）。適逢當年年底北、高兩市進行市長市議員改選，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對此進行的選舉訪談同時紀錄了民眾參與倒扁活動的狀況，因而提供所需的相關測量變數。此外，由於該筆問卷不是只針對特定活動參與者的焦點訪談，也讓本文得以同時比較參加跟沒參加群眾間的差異。

前言之後，第貳節回顧這場「反貪倒扁運動」的背景及過程，學界對此事件的觀察與討論也在此介紹；第參節則歸納三個用於解釋民眾參與抗爭的主要理論，各個不同學理的基礎及優缺點均會加以歸納彙整；第肆節除介紹 TEDS 面訪資料對本文研究的適切性，並依不同學派建構出對應的理論變數，而依照理性選擇理論所做的研究假設也會清楚交代；第伍節是資料的初探分析，提供讀者一窺 TEDS 調查結果的初步面貌；第陸節跟第柒節進一步選用了適當統計模型來分析參與抗爭活動的情形，透過不同抗爭形式的分類，藉以回應當年這項運動為何可以驅使這麼多民眾參與，以及支持者究竟有沒有選擇搭便車的狀況；最後是第捌節的結語及討論。

貳、「反貪倒扁運動」之背景與討論

雖然 2005 年 5 月任務型國代選舉的結果，民主進步黨創下得票率新高並一舉囊括過半席次的新紀錄，卻旋即因 8 月高雄市捷運外勞暴動牽扯出的總統府高層官商勾結弊端，使得陳水扁總統及其執政的滿意度開始鬆動。隔年 4 月，總統夫人吳淑珍被控收受 SOGO 禮券介入公司經營權之爭，方興未艾之際 5 月又爆發總統女婿趙建銘涉嫌股票內線交易，隨後並被聲請羈押獲准。正當窮於應付家族醜聞纏身，6 月份總統府內更被爆料以他人發票核銷國務機要費的弊案。一連串的濫權貪瀆事件，使得執政威信受到嚴重衝擊，

坊間更對陳水扁政府有「一妻、二祕、三師、四親家、五總管」輕蔑之說，在野黨派跟許多民間團體也開始訴諸一系列反扁的行動。¹

各界對終結此一政治亂象的呼應，始於 2006 年 6 月國民黨籍立法委員以「財政崩壞」、「毀憲亂法」為由，對陳水扁總統提出罷免案，此案雖獲親民黨團及許多無黨籍委員的支持，但由於民進黨與台聯黨團的杯葛，最終表決未達三分之二同意之法定門檻。此項罷免案未獲通過的影響深遠，因為依法無法再舉行罷免總統之公民投票，體制內的手段幾近告終。也因此，自 7 月起社會各界開始陸續發聲，除有大學生發起「民國維新運動」在中正紀念堂進行絕食抗議外，一批立場親綠的學者發起「民主政治與臺灣認同的道德危機——我們對總統、執政黨和臺灣公民的呼籲」聲明，希望陳水扁自動請辭總統一職，以樹立民主典範。而來自親綠陣營最震撼的呼喚，當屬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先生於 8 月 7 日撰寫一封給總統陳水扁的公開信，希望他勇於認錯並下台。由於朝野與社會各界的呼籲均未獲陳水扁總統的正面回應，於是施明德先生在 2006 年 8 月 10 日正式號召要籌組倒扁的抗爭運動。

由施先生發起的這項運動，主軸清楚地界定為「反貪倒扁」，目的就是喚醒民眾積極參與這項運動，最終希望可以迫使執政者屈從並下台。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在整個過程中運用了幾項重要手段並開啓一系列不同型式的活動：一是呼籲民眾每人捐款新台幣 100 元，原先預計進行一個月，但自 8 月 14 日開始至 25 日停止接受匯款為止，約十天便募集超過新台幣一億一千多萬元；二，自 9 月 9 日起開始在臺北市凱達格蘭大道靜坐示威，並獲當時的臺北市長馬英九破例核准可以進行過夜的集會；三，仿效泰國示威活動的形式，呼籲參與民眾自動自發穿紅衣走上街頭，表達對執政者的抗議及對該運動的支持，也因此參與這項運動者又被稱為「紅衫軍」；四是在 9 月 15 日倒扁活動撤離凱達格蘭大道前，發動大規模「圍城」示威遊行；五，自 9 月 29 日開始由施明德先生親自率隊發起「環島遍地開花」行動，巡迴全臺各地宣傳並鼓勵民眾支持；六，在國慶日 10 月 10 號發動「天下圍攻」遊行

1 請參見自由時報（2006 年 9 月 9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sep/9/today-p1.htm>（瀏覽日期：2014/11/15）（自由時報，2006）。

活動，抵制當日陳水扁總統主持的國慶大典。² 當時許多政治觀察家（如江宜樺，2006；廖元豪，2006等）都指出，紅衫軍發起的這場倒扁行動，儼然成爲臺灣社會少數超脫藍綠色彩的公民運動。

雖然這項「反貪倒扁運動」在當時激起相當大的迴響，可惜在學術研究的範疇至今未形成等比例的關注。除了一些研究生學位論文外，更嚴謹的學術文獻仍屈指可數。少數幾篇如趙剛（2006）主要是在詮釋運動後半段消沉的過程與原因，他認爲運動方向與手段的紊亂、未持續擴大社會基礎，以及綠營本土牌的出爐等，都是活動最後冷卻的關鍵因素。而蔡佳泓（2008）的焦點著重在貝式定理（Bayesian analysis）的介紹，民眾參與抗爭的意願比較像是此法應用上的例證，該文雖呈現該運動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的支持度與穩定度，但囿於資料與方法的限制，各地差異的原因未能有效解釋。而更有系統介紹此一運動的學術著作，當屬張福建（2009）主編的《公民與政治行動：實證與規範之間的對話》一書，此書除從規範性角度探討公民意識、公民價值與公民行動間的意義外，亦收錄多篇關於紅衫軍運動的討論。例如陳陸輝（2009）透過民眾政治信任感（political trust）與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的分類，觀察到低政治信任與高政治效能感的抗議型民眾較傾向支持倒扁活動，同時這項抗爭運動也激發了原本疏離（alienated）群眾的回應；此外，書中另一篇盛杏媛與鄭夙芬（2009）的文章則回到藍綠對立的基本面，發現即便公民意識、政治功效意識，或政治信任感會影響運動的參與度，但最終決定的關鍵要素仍舊是依據民眾藍綠政黨認同的方向感，簡言之，她們認爲該運動未能超脫所謂框架結盟（frame alignment）的概念。

參、抗爭行爲的理論基礎：個體層次的三種理論

到目前爲止這些分析紅衫軍倒扁運動的實證研究，基本上還是從傳統政治行爲的理論著手，試圖從民眾政治信任感、政治效能感、政黨認同或地緣

2 對於整個運動緣起與過程的回顧，可參考維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Million_Voices_Against_Corruption_President_Chen_Must_Go（瀏覽日期：2014/11/15）（Wikipedia, 2014）。

政治等投票行為的面向來做解釋。但如前所述，抗爭行為並非一般傳統的政治行為，若干倒扁活動涉及非法集會及佔領行動，依 Barnes et al. (1979) 的分類，甚至屬於非法行為的一種，因此恐怕無法完全依照合法的投票邏輯來加以論斷，這也是回顧國外研究這兩類政治行為的文獻，甚至少有交集的道理 (Bean, 1991: 254)。據此，本節回歸到問題的本質，嘗試從抗爭行為的理論著手，綜合整理三個主要詮釋民眾參與反政府抗爭行動的學理依據。

首先，算是最直觀也最容易詮釋個人參與抗爭理由的，是依據所謂的怨懟理論 (grievance theory/discontent theory)。該理論認為，之所以發生公民抗命 (civil disobedience，或稱公民不服從) 以及更進一步的抗爭、造反等反政府行為，均源自當事者對時局、施政或某特定議題的不滿 (Muller and Jukam, 1983: 159)。誠如開啓此派論述的 Gurr (1970) 所指，人民之所以願意站出來反抗政府，可視為對社會問題與現狀不滿意的反動，這些不滿因素常源於特定議題，如財富分配不均、政府政策偏頗等政府 (不) 做為而來，當這些問題導致人們遭遇相對剝奪感 (relative deprivation) 增加時，參與反政府示威甚至造反革命的可能性便大增。由於民眾對時政的這種不滿與抱怨通常與心理受到剝奪的感受環環相扣，亦有文獻將怨懟理論稱之為剝奪與相對剝奪理論 (deprivation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 (Opp and Roehl, 1990: 522)。

不管是因為政府本身製造出問題、抑或是政府沒將已發生的民怨問題處理好，怨懟理論支持者認為民眾都會歸咎給當局，並影響抗爭事件發生的機率 (Javeline, 2003: 107)。而許多探討開發中國家抗爭或造反的研究，也都是採用這類對政府的不滿或相對剝奪的觀點 (如 Muller et al., 1982; Scott, 1985; Canache, 1996; Kim, 1996; Loveman, 1998; Booth and Seligson, 2009 等)。然而，也有另一批針對已開發國家的研究，未發現民眾對當局的不滿與反政府行為間的必然關係。對此，Dalton et al. (2010) 認為不同的政治、經濟脈絡是怨懟理論忽視的外在因素，加上已開發國家客觀上不易形成強烈的不滿，所以在西方社會可能並不適用該理論。此外，Meyer (2004) 亦從政治機會 (political opportunity) 的角度，提出西方民主國家擁有一種開放體系 (open system) 的特質，具備不滿情緒可以疏通的渠道，因此民眾即便

有不滿或相對剝奪的感受，也不易形成反政府行爲。簡言之，怨懟理論實際運用在解釋抗爭行爲時仍受到諸多質疑，而更有系統的挑戰則來自下面另外兩個學派。

以社會學家爲主的資源動員理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爲其一，如 Oberschall（1973）、Gamson（1975）、Jenkins（1983）等此派學者認爲，單有民怨不足以成事，須具備轉換不滿成爲實際行動的能力，才是有些人願意參與抗爭的理由；因此抗爭的集體行動能否成功，關鍵在於組織或團體提供給成員運用資源的能力。對這些持資源動員論觀點的學者來說，組織在人力、物資、財務、溝通等影響動員能力上均具優勢，再加上身處團體裡容易讓成員形成行動的共識與共同利益，團體同儕壓力亦會促使成員不願自外於組織的集體行動，這種 Klandermans（1984: 584）所謂的社會心理擴張（social-psychological expansion）現象，將對組織成員參與抗爭的意願產生加乘效果。

資源動員理論不僅在詮釋已開發國家的抗爭優於怨懟理論，即使一些針對開發中國家的研究（如 McDonough et al., 1998；Bratton et al., 2005 等）也附和資源動員的觀點，認爲即便是在封閉、不發達、不民主的狀態下，資源越多的人參與抗爭行動的可能性也越大。然而，資源動員論者的想法在社會學界也不是被全然接受，Kornhauser（1959）爲首的大社會理論（mass society theory）便提出參與組織團體對抗爭行爲所起的作用，恰與資源動員論者所稱的相反；他們認爲無論是實質參與或只是心理依附團體，均應有助於該人融入現有的政治與社會體系，因此反體制的抗爭行爲反而不會出現。³ 此外，亦有 Klandermans（1984）等將參與組織較有利於資源運用的概念與成本效益的計算結合，可視爲將資源動員理論內化於下面要闡述的第三個學派——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之中。

3 Inglehart（1977）、Barnes et al.（1979）等都是大社會理論重要立論者，他們採此觀點詮釋 60、70 年代在美國及西歐風起雲湧的抗爭運動，認爲當時社會普遍存在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的價值觀，由於各政黨的政策與價值體系無法切合這股需求，造成民眾對政黨認同上的疏離，也因政黨做爲一種社會組織的功能性大幅降低，才造就這一時期諸多的社會抗爭。

理性選擇對抗爭行為的詮釋，可視為對傳統怨懟理論最大的挑戰。理性選擇論者對此的看法源自 Olson (1965)、Tullock (1971) 等人的經典著作，基本上是認為相對剝奪感所造成的不滿心態，對一位理性自利的人在決定是否參與抗爭活動時，並不如怨懟理論想像般具絕對的影響力。在理性選擇理論的觀念裡，民眾對時局的不滿被視為對特定議題的需求或偏好狀態，而這種需要或偏好具有所謂的公共財 (public good) 屬性。從抗爭的目的是欲排除或減少民怨來看，與一般公共財是想獲取的需求方向有所不同，因此在經濟學理論亦常以公共之惡 (public bad) 來描述這類型的公共財。但不論是以公共財或公共之惡為名，同具公共財概念中的非敵對性 (nonrival) 與非排他性 (nonexclusive) 兩項特質。以抗爭行動為例，非敵對性代表一旦抗爭成功讓當局下台負責或取消引發民怨的政策，所有民眾皆可享受同等抗爭成功的結果，即便多增加一個人來享受，其他人的邊際效用也不會降低；非排他性則代表當抗爭成功後，無法排除特定民眾分享這樣的成果，包括那些沒有付出抗爭代價的人也一樣。

正因為公共財或公共之惡供給時的這兩項特質，個人不論參加抗爭與否都會獲得同等的效用，加上若理解到自己一人的作為對團體抗議成不成功的影響力微乎其微的話，即便他 / 她對政府或政策有很強的抱怨，也不會想過度承擔參與抗爭的成本 (如個人承受的時間、金錢、身體受傷等)，因此選擇不參加活動的搭便車者 (free rider)，便成為較理性的個人決策 (Finkel et al., 1989: 885-886)。也因為相關論述特別強調集體行動中公共財對個人選擇效用的影響，有學者以集體行為之公共財模型 (public good model of collective behavior) 稱之 (如 Gibson, 1991)、抑或集體行動理論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如 Opp, 1990; Opp and Roehl, 1990) 稱之。

按照公共財的概念，理性選擇理論預期民眾無論不滿程度的多寡，基本上會選擇缺席 (abstention)，或是至少該非常節制的參與抗爭活動；不過由於這樣的論點只說明那些不去參加抗爭的心態，而未解釋另一群去參與者的動機，因此理性選擇提出選擇性動機 (selective motivation) 或私人利益 (private benefit) 的觀點，認為真正影響一些人參與抗爭的原因，反而是一些與議題或行動目標無關的個人效用 (Finkel et al., 1989: 886)。根據 Tullock (1971)

的解釋，這種驅動個人參與抗爭的動機除了看得見的物質誘因外，也可以是非物質的，像是爲了權力、地位，甚或娛樂效果均屬之。而理性選擇提出這類從屬個人的誘因，其實不僅止於解釋抗爭行爲，從 Olson (1965) 著作不難發現幾乎所有具公共財特質的集體行動皆被涵蓋在內。

雖然理性選擇理論看似與怨懟理論格格不入，但由於對時政的不滿與責難確實是誘發集體抗爭的源頭，因此許多學者（如 Klandermans, 1984 ; Muller and Opp, 1986 ; Finkel et al., 1989 ; Opp, 1990 ; Gibson, 1991 ; Opp and Roehl, 1990 ; Finkel and Opp, 1991 ; Finkel and Muller, 1998 ; Javeline, 2003 等）嘗試將不滿心態與抗爭納入個人效用計算之中，以試圖解決人們可能搭便車的困境。綜合歸納起來，理性選擇至少提出兩個面向來詮釋：一是關於民眾對自身行動影響力的認知 (perceived influence)，也就是當人確信自己的參與跟貢獻最後會影響公共財的供給時，此時搭便車的心態與舉止便會大幅降低；換言之，對政府不滿的群眾唯有確信自己的付出可以得到當局回應，才會積極出面參與抗爭。其二是提出集體理性 (collective rationality) 的概念，也就是當民眾認知到若團體裡所有人都搭便車時，最後行動結果注定會失敗，形成所謂集體不理性 (collective irrationality) 現象，爲避免這種狀況的發生，還是會有不滿的民眾選擇站出來。⁴ 有別於傳統理性選擇強調公共財困境以至於怨懟反而有減動員 (demotivation) 效果，這些修正路線其實是提出可以幫忙解釋抗爭行爲的理性因子，因此可稱爲工具性公共財誘因 (instrumental public good motivation) (Finkel and Opp, 1991: 346)。

綜上，關於抗爭行爲的這三大學理實各有千秋，過去被應用在詮釋不同時期、事件、地區時也各擅勝場，惟綜合各家學派一併考量者並不多見，本文據此嘗試納入不同的理論變數，希冀建構出一套整合的分析模型。不過，

4 相較於抗爭行爲，集體理性的概念被理性選擇更常運用在詮釋投票行爲，即理性計算下本當不去投票的決定，主要是靠集體理性帶出的公民責任感來消弭 (王鼎銘, 2007: 11)，這種 Riker and Ordeshook (1968: 28) 稱之的投票表達價值 (expressive value of voting)，不屬選舉結果所帶來的效用，因此可以避免公共財的問題。不過回顧抗爭行爲文獻，集體理性這種決定性的影響並未被特別彰顯出來，比較強調此項特性的僅 Finkel et al. (1989)、Finkel and Opp (1991) 等少數理性選擇論者。

基於理性選擇在國外相關研究已漸成主流論述，加上它是唯一試圖同時解釋參與跟不參與抗爭的理論，下一節將依此做出本文的研究假設，並實際驗證民眾參與倒扁運動背後的機制。

肆、資料、變項與研究假設

抗爭行為的實證分析，除少數特殊例外，多採調查方法來觀察示威抗議者的參與狀況。⁵ 然而跟一般初選、投票、競選等傳統政治行為不同，靜坐、示威、遊行等非典型的政治決策沒有辦法規範在特定時間內發生，許多情況甚至無法預先得知抗爭活動的發生，因此極易產生資料蒐集上的限制（Finkel and Muller, 1998: 37）。所幸針對「反貪倒扁運動」的調查，目前除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在 2006 年 10 月活動期間進行的「民主動員與公民意識」電話訪問外，2007 年初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執行的「2006 北高兩市市長選舉面訪案」（TEDS 2006C）亦收錄相關題組。雖然樣本限縮在北、高兩市的受訪者，但 TEDS 資料最大優點是自抗爭運動告一段落後才開始蒐集，避開事件發生當下的敏感性與合法性問題；也因此，TEDS 問卷的特色是可以直接詢問實際參與抗爭的細節，而非如選研中心的數據得靠間接的意願或態度加以衡量，本文據此採納 TEDS 2006C 分析之。該筆資料中，北、高兩市分別完成 1,235 與 1,262 份獨立樣本，除了選舉題目因候選人不同而有差異外，兩者的執行單位、抽樣方法、問卷設計、調查方式、乃至編碼模式皆完全一致，後續將一併納入進行分析。⁶

5 自理性選擇理論興起以來，抗爭行為研究特別著重在詮釋個人參與的狀況，因此多採調查資料為之。但亦有一些特殊的例外，像 Francisco（1993）以日期為分析單位，計算抗爭人次的比例；或如 Dalton et al.（2010）為進行跨國比較，合併個體民調資料與總體政治經濟資料來做分析。

6 本文使用的資料全部係採自「2006 北高兩市市長選舉面訪案」（簡稱 TEDS 2006C）（國科會計畫編號 NSC 95-2420-H-031-011），計畫主持人為東吳大學黃秀端教授，由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及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負責執行，於 2007 年 1 月至 4 月進行訪員實際訪談。「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多年期計畫總召集人為國立政治大學黃紀教授，詳細資料請參閱 TEDS（2006-2007）網頁：<http://www.tedsnet.org>。作者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惟本文之內容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爲了有效詮釋參與反扁的抗爭，自變數承襲上一節既有研究文獻的討論，嘗試建構出足以涵括這三個主要的理論。首先是關於怨懟理論所衍生的怨懟心態，設定雖看似簡單，但如 Javeline (2003) 所說，對於政府不滿的怨懟需有特定可以咎責的對象方可將這股民怨轉換成行動的動力，諸多類似研究面臨的問題即在實際上常無法歸咎哪一政治人物、哪一政府單位需要爲問題負責。所幸本文探討的這場抗爭運動，焦點鎖定在扁家及其執政貪腐問題之上，所訴諸的活動目的也明確指向陳水扁總統下台負責，因此對象上相當明確。至於對陳水扁怨懟程度的測量模式，本文採 TEDS 問卷 E1A 與 I2 兩題爲準，一是關於受訪者對陳水扁的偏好程度，二是認爲陳水扁清廉程度的測量。兩題組問卷設計詳如附錄一所示，本文採衡量態度量表慣用之因素分數 (factor scores) 來測量怨扁的程度。類似這種綜合測量怨懟態度的模式，可見諸 Finkel et al. (1989)、Finkel and Muller (1998) 等研究。透過信度分析 (reliability test)，本文所選這兩題組的 Cronbach's alpha 達 0.855，顯示這兩題組確具內部一致性 (internal consistency)；而因素分析後得到的因素負荷量 (factor loading) 達 0.934，更可謂完全符合建構效度 (construct validity) 的要求。

至於對此一關鍵變數的預期，雖就怨懟理論來看會是促成民眾參與反扁活動的關鍵，但理性選擇論者持完全相反觀點，也就是反扁情緒及抗爭所達成的效果屬於一種公共財，即使再不滿阿扁也不會對抗爭活動產生實際影響。本文據此推論第一項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 1：對貪腐不滿而希冀阿扁下台的偏好，被理性選擇理論視為具公共財屬性，因此不會轉化成實際倒扁的行動。

另一方面，由於臺灣政治與公共政策長期存在藍綠政黨及族群意識形態的糾葛，即使是對扁政府貪腐的不滿也恐難跳脫，因此本文模型會將政黨認同及臺灣人認同感兩類變數納入。不過，除了怨懟理論跟理性選擇理論的爭辯可能導致這兩個本土變數效果難以預期外，這種關乎政治與社會心理依附的態度，在形塑非典型政治行爲時也未見學術上的共識。以政黨認同爲例，即便它在詮釋投票行爲時的重要性與一致性無庸置疑，但在非典型政治行爲

時便有兩派迥異的觀點：一是政黨整合（party integration）論，認為具強烈政黨認同者偏好穩定的政治體系，因此較不會支持民主體制外的抗爭行動；另一持政黨動員（party mobilization）觀點者，則接受資源動員理論的概念，主張有強烈特定政黨傾向的人會比沒有政黨偏好者更容易被動員並積極參與抗爭（Finkel and Opp, 1991: 341-342）。⁷ 究此，著眼於這種政治社會心理變數的影響效果未有定論，不同論點間更有著南轅北轍的差異，本文暫難評斷其影響方向及顯著性。

除對當局不滿情緒外，另一個左右抗爭行動面臨公共財困境的變數，也是 Klandermans（1984）、Muller and Opp（1986）、Finkel et al.（1989）、Opp（1990）、Opp and Roehl（1990）、Finkel and Opp（1991）、Finkel and Muller（1998）等實證研究皆納入觀察的，是民眾對自身行動影響力的認知（perceived influence），他們咸認要避免搭便車的發生，是需要對自己行動影響結果深具信心才行。此一工具性公共財誘因其實近似政治行為中的政治功效（political efficacy）概念，Gibson（1991）等便是直接以個人的效能感加以測量，本文據此以 TEDS 問卷中 C1~C3 三題關於政治效能感的題目為之。這三個關於政治效能感的問卷設計詳見於附錄一，本文後續也是採一般對此慣用的因素分數來做測量。⁸ 至於此一變數的研究假設除可從理性選擇得知外，依陳陸輝（2009）、盛杏媛與鄭夙芬（2009）等傳統政治行為的視野來看抗爭，亦可得出如下的預期：

7 根據 Finkel and Opp（1991）的歸納整理，關於政黨在誘發抗爭行動上的角色與作用，政黨動員論與資源動員理論相通，而政黨整合觀點則與大社會理論相近，不同之處在於前者僅專注在政黨及其認同程度的詮釋，而後者關注的團體範圍與種類遠大於前者。

8 政治效能感依照 Campbell et al.（1960: 187）的定義，是人們認為「個人的政治行動對於政治過程是有影響或是可以產生影響的」。此一民眾的主觀認知已被驗證會深切地影響傳統投票參與的狀況，惟此一主題的文獻多半與抗爭等非傳統政治行為無涉，在此暫不予以討論。至於 TEDS 這幾道政治效能感題目的 Cronbach's alpha 雖僅滿足低標（=0.535），然因素分析的結果僅有一個因素的特徵值（eigenvalue）超過 1（=1.584），加上模型的累進變異量（cumulative variability）在首個因素已被解釋 52.8%，其後便開始大幅降低，因此從因素分析檢測結果來看項目間的單一面向性（unidimensionality）或同質性（homogeneity）並無疑義，可謂相當穩固地支持本文及相關研究將這類題組歸類的作法。

假設 2：政治效能感高者較認為自己的做為可以對政府產生影響，因此越有可能參與反貪倒扁行動。

最後一個關於理性選擇文獻所擷取的變數，是最沒有統一測量標準的抗爭參與成本。少數幾篇提到抗爭成本的，如 Gibson (1991) 是以自認遭受法律懲罰的可能性有多強來測量；Finkel and Muller (1998) 則進一步從受訪者對三種事情的認知程度著手，一是自認有多少可能警方找上門或會有出庭的麻煩，二是認為有多大可能性身體會因參與抗爭受傷，三是參與抗爭對自身時間束縛的多寡。這類抗爭的成本，Finkel and Opp (1991: 351) 也稱為物質誘因 (material incentive)，其特性是它屬於個人利害關係的考量，有別於抗爭行動追求的集體效用。

可惜的是類似的問卷設計通常不見諸一般的調查，當然也不包括在 TEDS 的規劃之列，因此本文改以受訪者的居住地來衡量所需的時間跟交通成本。簡單來說，由於多數倒扁行動發生在臺北市區，高雄市民北上所需付出的交通與時間成本都遠大於臺北市民，因此從理性選擇理論角度窺之，他們參與活動的意願應該比成本較低的臺北市民偏低。當然，由於臺灣南綠北藍的政治氣候差異，雖不排除城市變數會有源自地緣政治的差異，但本文稍後提出的統計模型將控制前述不同地區受訪者的政黨認同、族群意識，以及下面要談到的省籍差異，在納入這些控制變數後，地理因素本身的解釋力或可單純從抗爭地點的距離遠近及其所需付出的成本差異來做推論。

假設 3：根據理性選擇提出的成本概念，高雄市民由於承擔較多時間與交通成本，參與倒扁運動的次數會低於臺北市民。

最後是關於資源動員理論的變數，這也是另一組相當不確定的變數組合。根據 Verba et al. (1995) 針對美國境內示威抗議的研究，包括工會、教會、社團或政黨等都可能產生影響力，民眾參加並融入這類團體會同時提升傳統與非傳統政治活動參與的可能性；不過，他們同時提出不同組織的影響效果會依不同特定議題而定，所以究竟是何種團體較容易誘發組織成員參與抗爭，其實在相關研究中並無定論。以倒扁運動來看，或許當時最具動員效

果的當屬施明德為首的紅衫軍，但由於這並不是一個組織化、常態性的團體，也無會員制以供歸類，所以本文無法觀察歸屬此一特定組織的群眾；至於其他像工會、社團等在這場運動中更無特殊的角色與定位，因此是否加入特定組織團體恐怕無法成為測量民眾資源運用狀況的指標。

不過除了參加特定組織外，Verba et al. (1995) 另提出可依不同資源所做的群體分類，例如他們認為當事者的教育水平跟收入水準都會影響，不僅指這些變項形塑他們所屬的群體特性，也因為這類資源提供民眾所需的政治技巧與知識，可成為援助日後參與抗爭行為的源頭。根據他們廣泛地對於團體及資源所下的定義，本文除加入教育及所得外，由於年齡及省籍同屬民眾間群體辨識度相當高的變數，亦極易形成共同利益與相近的理念，因此一併納為控制變數。至於對這幾個變數結果的預期，依資源動員理論來做演繹，雖可能對抗爭運動的參與產生一定的影響力，但前述 Kornhauser (1959) 等大社會論者又提出相左的立場，認為依附群體有助於個人融入既有的政治與社會體系，因此反體制的抗爭行為反而不會出現。基於這兩個完全對立的社會學觀點並非本文著墨的焦點，加上這幾個變數並不完全屬於狹義特定團體的動員範疇，因此本文單純視它們為控制變數，暫不予提出其結果的假定。

伍、資料的初探分析

表 1 將本文所採的各變數名稱、定義及敘述統計逐一呈現出來，取自 TEDS 2006C 的對應題組詳見於附錄一。其中需特別說明的是抗爭依變數的特色，該筆調查關於這個問題其實有兩個選擇，一是題號 I4 問到『施明德等人在去年九月間發起的紅衫軍反貪倒扁運動，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運動？』但由於這題詢問的是受訪者的態度而非實際作為，對衡量抗爭行動來說恐免不了測量誤差的質疑，因此本文改採另一題 I5『在這段期間，請問您有沒有去參加下列活動？』此題的架構較為縝密，將運動期間主辦單位所設計的各种活動皆納入選項之中，包括捐款、穿紅衣、靜坐、九月圍城活動、十月天下圍攻活動、遍地開花活動等。從調查結果來看，這六項活動依序有 264、169、85、78、72、40 人次參與。值得注意的是，雖各選項人數逐次遞減，

表 1：變數定義與敘述統計

變數名稱	定 義	平均數／標準差
COUNT	參與抗爭次數，計數資料	0.287/0.855
GRIEV	反扁怨懟情緒，因素分數	1.48e ⁻⁰⁸ /0.864
DPPID	民進黨認同者，虛擬變數	674 (人次)
KMTID	國民黨認同者，虛擬變數	864 (人次)
NOPID	無政黨認同者，虛擬變數	959 (人次)
TAIID	臺灣人認同感強度，順序尺度	2.814/1.471
POLEF	政治功效意識，因素分數	9.61e ⁻⁰⁹ /0.710
DISTA	受訪者住在高雄市，虛擬變數	1262 (人次)
AGELG	受訪者年紀，採對數值	3.779/0.368
EDUCA	受訪者教育水準，順序尺度	8.545/3.333
INCOM	受訪者家戶所得水準，順序尺度	5.423/3.059
MAINL	受訪者爲外省籍，虛擬變數	499 (人次)

但由於複選的設計型態使得各項活動參與者並不一定重覆，以參與靜坐過的人爲例，當中有 35% 沒有捐款、19% 未著紅衣支持、46% 沒參加圍城活動、54% 沒去天下圍攻、74% 沒參與遍地開花行動，因此從複選答題的狀況來看並未發現受訪者有單極一致的參與狀況。此外，由於這幾項活動並沒有明顯步驟性的設計，加上任一活動都是讓民眾自由選擇參加，因此參與抗爭各項活動明顯具有計數資料 (count data) 的特性，下一節開始將據此特性加以分析。

除抗爭具計數資料的特徵外，在自變數方面，受訪者的政黨認同、居住地代表的距離變數、省籍等爲虛擬變數；反扁的怨懟情緒、政治效能感兩者透過因素分析萃取出，資料型態屬一般的連續尺度；臺灣人認同感、教育水準、所得水準則採原始 TEDS 設計的順序尺度爲之；至於年齡是採一般行爲研究慣用的非線性關係之對數值。除表 1 的敘述統計值外，爲初步理解這些變數與抗爭間的關聯性，附錄二整理出變數間相關係數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矩陣及其顯著水準。當中可見民進黨認同者、臺灣人認同感較強者、及距離較遠的高雄市民等，與抗爭次數產生負相關 (相關係數分別爲 -0.225、

-0.273、-0.196)，其餘自變數則呈現正相關，且又以怨懟情緒與抗爭的關聯性最強（相關係數為 0.316），甚至超過傳統的政黨認同、族群意識、省籍情結、地緣關係等概念。

由於虛擬變數在應用相關係數時得特別小心，這裡再直接以當中幾個虛擬變數與抗爭間的分佈狀況做一說明。首先從不同政黨認同分類來觀察，認同民進黨的 674 人中有 97% (=653 人) 未參加任何形式的抗爭，僅 14 人（約 2%）承認參加；反觀認同國民黨的受訪者中，承認至少參加過一次抗爭的比例達 33% (=286/864)；而沒有政黨認同的 959 人中，近九成 (=854 人) 沒有參與任何抗爭。這一分佈狀態顯示不同黨派認同者確實有不同的反扁立場，國民黨支持者較無黨派獨立選民更傾向參與抗爭，獨立選民又較民進黨支持者願意站出來反扁。再從省籍差異來看，外省族群有 33% (=165/499) 參與過反扁行動，本省族群參加過的僅約一成 (=225/1998)，兩族群立場的差異相當明顯。最後從兩城市的受訪者來比較，臺北市民沒參加抗爭的比例雖達 77% (=956/1235)，但與高雄的 89% 相比 (=1120/1262) 仍有一段距離，顯示臺北這個反扁活動集中地確實吸引較多人參與。

從臺灣政治發展的脈絡及一般對臺灣政治生態的理解來看，目前從 TEDS 調查數據所得到的初探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包括不同政黨支持者、族群意識不同的人、出身南北不同地區、不同省籍的人等，傳統觀念裡都預期會有不同的政治立場，而這裡便將這種鮮明的立場延伸至非典型的抗爭行為上。然而，目前的初探僅止於驗證資料的結構無誤，由於相關係數僅偵測兩兩變數間的線性關係，在未透過進一步迴歸分析前暫無法排除其他變數的交錯影響，因此此時顯示的關聯性仍不宜過度詮釋。究此，下一節將透過進一步的統計模型，以綜合探索這些變數與抗爭間的確切關係。

陸、民衆參與「反貪倒扁運動」之實證分析

由於民眾參與反貪倒扁運動次數具計數資料的特性，是大於或等於零的整數，此時若逕以 OLS 進行估計，會致使預測值可能產生負數，導致無效、不一致，甚至是偏誤的估計量 (Long, 1997)；此外，以 OLS 分析計數資料

也可能存在殘差的變異數不齊一 (heteroscedasticity)，故所估計之標準誤及相應的顯著水準也不再準確 (DeMaris, 2004)。為避免這些問題，本節將採專門估算計數資料的統計模型為之。

一般處理間斷性計數資料最常假定的抽樣分佈形式，是單峰眾數 (unimodal) 且向右偏斜的卜瓦松分配 (Poisson distribution)，並據此採卜瓦松迴歸 (Poisson regression，簡稱 PR) 來做分析。⁹ 卜瓦松分配雖是常見的離散機率分配，但其設定條件為變數的期望值必須等於變異數，也就是均等分散 (equi-dispersion) 的狀況；惟實際狀況常是後者大於前者，產生所謂過度離散 (over-dispersion) 的現象，此時即使擁有大樣本數，卜瓦松迴歸係數的標準誤仍會被低估，導致本來不顯著的變數可能變成顯著，進而影響統計推論的一致性 (Agresti, 2007)。

為因應計數資料過度離散的狀況，有兩種常見的分析模型可供選擇。首先是所謂的負二項迴歸模型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簡稱 NBR)，NBR 模型和一般 PR 模型同樣適用於一段時間或空間內事件發生為計數資料，不同之處在於期望值中加入另一種分佈形態的離散參數 (dispersion parameter)，使得資料變異數與平均數不需滿足均等分散的狀況。¹⁰ 另一個常用的，則是服膺廣義卜瓦松分配 (generalized Poisson distribution) 所發展的廣義卜瓦松迴歸 (generalized Poisson regression，簡稱 GPR)。¹¹ 相較於 NBR 模型只能處理過度離散的狀況，GPR 模型適用的範圍更廣，即便是變異數小於平均數的過度集中 (under-dispersion) 亦無不妨，因此一些比較過

9 事件發生次數要滿足卜瓦松分配的話，理論上有幾項先天條件得要符合，包括：事件次數與測量區段長短有關、各事件次數獨立性、事件發生次數與測量區段長短成正比，以及區段很短時發生兩次或兩次以上的機率趨近於零等 (Hogg and Graig, 1995)。

10 負二項分配主要設定是數值的平均數與變異數加入具伽瑪分配 (gamma distribution) 的離散估計參數 α (α)，若 $\alpha=0$ 則此模型便退回成為卜瓦松迴歸模型，不為 0 時則資料存在過度離散的現象。負二項迴歸模型估算的最大概似函數設定，在 Cameron and Trivedi (1998)、Winkelmann (2000) 等皆有詳細的說明，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參考。

11 廣義卜瓦松分配最早由 Consul and Jain (1970) 提出，此一分配亦是將離散參數用於估計期望值，其離散參數 δ (δ) 的設定是當它為 0 時是均等分散，此時即回歸到卜瓦松分配，而當 $\delta>0$ 是過度離散， $\delta<0$ 則是過度集中。關於該模型的設定，可參考 Consul (1989) 等更詳細的討論。

兩者的研究（如 Hilbe, 2011）提出 GPR 模型使用上更具彈性。表 2，便將上述這兩種模型以最大概似法估算出的結果分別呈現出來。

由於採用這兩個模型的優點在於避免過度離散的問題，因此估算後的首要工作便是檢定離散估計參數值（dispersion parameter）。NBR 與 GPR 模型估算出的離散參數 α 與 δ 分別是 0.957 與 0.415，兩者皆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這筆資料要達到平均數與變異數期望值均等的分佈型態幾乎不可能，明顯支持了本文不採傳統 PR 模型的理由。其次，進一步以兩模型整體的 χ^2 檢定

表 2：參與反貪倒扁抗爭活動之分析

	NBR 模型	GPR 模型
	β (S.E.)	β (S.E.)
GRIVE	0.010 (0.290)	0.020 (0.293)
DPPID	-1.298 (0.357)**	-1.293 (0.356)**
NOPID	-1.020 (0.288)**	-1.017 (0.103)**
TAIID	-0.397 (0.103)**	-0.398 (0.097)**
GRIVE×DPPID	0.579 (0.509)	0.580 (0.507)
GRIVE×NOPID	0.721 (0.341)*	0.714 (0.341)*
GRIVE×TAIID	0.322 (0.123)**	0.319 (0.123)*
POLEF	0.164 (0.085)	0.164 (0.087)
DISTA	-0.822 (0.139)**	-0.825 (0.139)**
AGELG	0.686 (0.194)**	0.712 (0.199)**
EDUCA	0.087 (0.028)**	0.089 (0.029)**
INCOM	0.025 (0.023)	0.024 (0.024)
MAINL	0.423 (0.127)**	0.427 (0.128)**
CONS_	-3.674 (0.897)**	-3.778 (0.916)**
α/δ	0.957 (0.168)**	0.415 (0.068)**
N	1378	1378
Log likelihood	-795.35	-795.62
Chi ²	411.21	236.08
Prob>Chi ²	0.00	0.00

註：括號內的數值為標準誤（standard error），* $p < 0.05$ ，** $p < 0.01$ 。

結果來看，也顯示本文變數架構整體而言具相當滿意的吻合度；而兩者近似的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a (AIC, 分別為 1620.70 及 1621.25)，更顯示它們配適狀況不分軒輊，加上 NBR 與 GPR 係數估算值及檢定結果相當一致，接下來對各變數估算結果的解釋將一併做說明。

先從怨懟理論的主要變數 GRIVE 來看，雖未顯著地直接促成民眾參與抗爭，但它與政黨認同感、臺灣人認同感的交叉項呈現正向顯著水準，顯示透過這些變數產生的間接影響力不容小覷。¹² 進一步來說，認同民進黨跟無政黨認同的獨立選民都比國民黨認同者不願意參與倒扁行動，不過顯然高漲的怨扁情緒容易抵銷獨立選民反對抗爭的立場，顯示怨懟情緒確實會改變這類民眾的意向。而這種政治氛圍，也同樣呈現在臺灣人認同感及其與怨懟變數的交叉項上，顯示臺灣意識較高者雖較不願意倒扁，但這種對抗爭的消極態度容易被怨懟情緒激發。不過，表 2 結果同時發現這種怨懟的情緒效應並未出現在民進黨支持者身上；也就是綠營人士即便再不滿當時扁政府的貪腐或施政作為，也不會增加他們參與這項抗爭的意願。此一結果呈現出民眾的行動仍受制於藍綠認同的心態，該運動或如盛杏媛與鄭夙芬（2009）等人所說，未超脫藍綠基本面的框架。

再從廣義資源動員角度所加持的控制變數來看，除不同收入階層的差異效果不顯著外，表 2 發現年紀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以及外省族群，參與反貪倒扁活動的可能性越大。以 GPR 模型係數的發生率比值 (incidence rate ratios, IRR) 來看，教育程度較高者 (EDUCA) 有高出 9.3% ($= (e^{0.089} - 1) \times 100\%$) 的可能性去參加，外省族群 (MAINL) 比本省族群則多 53.3% ($= (e^{0.427} - 1) \times 100\%$) 的比例，而 AGELG 顯示年紀大者增加參與活動的比例更多出

12 本文實證模型採政黨認同、臺灣人認同感二者與怨扁情緒間的交叉變數 (interaction terms)，其目的不外是探究這些變數間的交互作用。這些變數的選取一方面是取決於臺灣社會的經驗法則，亦即當年反扁及反政府的情緒，明顯與政黨認同感、族群意識糾結在一起，這看法在學理上也獲盛杏媛與鄭夙芬（2009）等研究的支持；另一方面從統計理論的角度來說，透過附錄二各變數間的相關係數值，也說明了怨扁情緒確實是與這兩者呈現高度相關性 (相關係數值超過 0.5)。同時基於附錄二的係數值顯示該變數未與其他自變數產生連結，加上未見學術理論支持怨扁情緒與之的交互作用，基於模型建構的簡約法則 (law of parsimony)，本文僅採政黨認同及族群意識這兩者的交叉變數。

一倍有餘 ($(e^{0.712}-1)\times 100\%=103.8\%$)。換言之，結果凸顯出同儕團體內的壓力、共識甚或利害與共的關係，所產生的社會心理擴張現象，或許在這場反貪倒扁行動中發揮了影響力。

然而表 2 最重要的發現，莫過於理性選擇是這三個抗爭理論中最沒產生效果的。唯一的例外是成本變數，結果顯示居住在高雄市的民眾 (DISTA) 較不會積極參與反扁活動；但如前所述，此一變項除成本誘因外，也可從臺灣南北地緣或文化差異的角度來詮釋，可能無法完全盡歸理性選擇理論之功。此外，政治效能感 (POLEF) 的估算結果，完全未彰顯出此一學派宣稱的「工具性誘因」，也就是政治功效意識較高的人未如預期地積極參與活動。更感困擾的是，前述怨扁的不滿情緒扭轉了一些政黨認同、臺灣人認同感的作用，激發原本不支持的民眾出來參與活動，顯見怨懟的影響力不如理性選擇論者預期般的孱弱。換言之，對扁不滿之情似乎可以消弭公共財的困境，民眾面對政府進行抗爭時的搭便車情境不若想像般的嚴重。

相較於理性選擇的觀點，表 2 結果其實反而更接近傳統政治行為理論的看法，也與先前一些研究的結論相仿 (如蔡佳泓，2008、盛杏媛與鄭夙芬，2009 等)，亦即民眾的政黨認同、族群意識、省籍問題、地域因素等，都會直接影響倒扁運動的參與情況。然而目前這種看似穩健、安全的推論卻也隱藏著一些挑戰：其一，根據 Bean (1991) 的整理，抗爭與傳統政治行為不盡相同，不論是文獻、學理的交集都不多，其研究亦顯示兩者的分析結果迥異，何以在解釋臺灣發生的抗爭活動時卻可自行其事？傳統政治行為的論述真的可以滿足這兩種本質迥異的行動嗎？其二，也由於抗爭的性質與投票行為不同，一般的認知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較願意承擔這種高風險高成本的政治運動，為何這次倒扁行動可以像一般選舉一樣，反而是吸引較年長者的參與，難道這次倒扁運動有不同於一般抗爭的特殊之處？第三也是最為嚴重的，上一節提出的三個理性選擇假設中，目前結果直指當中兩個是被否定掉的，因此不僅必須承認這次抗爭沒有出現搭便車的狀況，也無法確認參與者自知影響力薄弱而躊躇不前。由於這些問題很弔詭的勾露出臺灣民眾面對抗爭時會是多麼的「不理性」，為進一步探究箇中緣由，下一節重回「反貪倒扁運動」的行動內涵來回應上述的問題，並利用進一步的統計分析解釋該運動如何避

免集體行動下的公共財困境。

柒、「反貪倒扁運動」中的公共財困境

如前所述，公共財由於具有非敵對與非排他兩項特質，容易造成該貨品消費者有搭便車的情形，形成市場失靈的狀況，這在一般經濟學理論下誠無疑義，也是國外文獻闡述抗爭行動時的主要焦點。不過上一節初步分析的結果顯示，民眾參與倒扁活動的情況顯然沒有受到這種公共財效用的影響，諸多政治與社會心理變數依舊左右著民眾的熱情投入。為理解這個現象，本節試圖從該運動的活動設計來做解釋，特別是關於捐款百元的活動。

2006年倒扁運動之初，施明德先生號召群眾每人捐款新台幣百元，遠較原先預估一個月的時間為短，十幾天內該運動便募集了約130萬人的匯款，進帳超過新台幣一億元。是項募款活動誠然是倒扁形式的一部分，也是鼓動許多民眾站出來的重要力量，不過做為評估抗爭行爲的一環有兩點值得商榷之處：第一，施明德等運動領導成員於8月25日停止對外募款，九月初發表「九九運動宣言」後宣告倒扁行動登場，民眾於9月9日集結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開始靜坐。因此，募款活動比較像是正式活動開始前的前置或暖身作業，嚴格說來民眾的捐款行爲應該不屬直接參與抗爭的一部分。第二，為凸顯擁有「百萬」紅衫軍，施明德呼籲民眾每人捐新台幣100元的方式，當捐款累計至一億元時，代表有一百萬人參與的正當性。若仔細推敲，該活動所要求的金額非常微薄，加上可以匿名認捐，這都與一般正常抗爭需上街拋頭露面，具高風險高成本的特性不符。因此從Barnes et al. (1979)、Bean (1991)等對抗爭行爲的歸類來看，這項捐款行動恐怕連合法抗爭都不屬之。

究此，本節接著將問卷中民眾參與捐款的次數予以排除，不再納入參與抗爭活動的計算之列，畢以觀察與上一節的統計結果有何異同。不過從數據分析的角度來說，那264位承認金錢捐助過紅衫軍的受訪者活動次數被減少一次後，容易衍生出計數資料另一常見的問題，也就是樣本觀察值裡有過多的零(excess zeros)。這種情形在應用計數資料的文獻中屢見不鮮，為應付高

比例零值導致模型配適度不佳的問題，統計學界另提出零膨脹分配（zero-inflated distribution）的修正模式。¹³ 不過像 Grumu and Trivedi（1996）、Allison（2012）等皆指出，即使計數資料有過多零次的狀況，NBR 模型其實並不亞於一般零膨脹分配模型的結果。但為更嚴謹觀察現身抗爭的次數，本節加採 Famoye and Singh（2003; 2006）提出的零膨脹廣義卜瓦松迴歸（zero-inflated generalized Poisson regression，簡稱 ZIGP）做為比較，其特色是在處理資料過度離散與過度集中的同時，也可應付零值比例較高的狀況。¹⁴ 表 3 便將 GPR、NBR、與 ZIGP 這三種模型估算的結果分別呈現出來。

先從各模型的離散參數估計值來看，彼此均達正向顯著水準，顯示次數重整後過度離散的分佈狀態未變，這幾個模型因此都優於一般卜瓦松分配的結果。進一步透過 ZIGP 模型與一般零膨脹分配模型比較的概似比檢定（likelihood-ratio test）（檢定值為 6.97， $P < 0.01$ ）來看，明顯呼應了 ZIGP 模型較之為佳，更直指輕忽過度離散可能會衍生配適度不佳的問題。至於三個模型間的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a（AIC）分別為 691.98、684.05 與 684.46，顯示彼此的鑑別度差異不大。不過從比較 ZIGP 與 GPR 模型的 Vuong test 檢定結果觀之（ $Z = 22.66$ ， $P < 0.01$ ），兩模型解釋力並不完全一致，顯著且正向的檢定值表示 ZIGP 模型較 GPR 模型為佳，因此應付過多高比例零值的狀況或有其必要。雖然 NBR 與 ZIGP 兩模型先天上皆顧慮到零值的情形，但基於 AIC 指數稍佳，三個模型若一定要分出高下以 ZIGP 模型為先。

13 零膨脹分配由 Mullahy（1986）提出，適用該分配的模型包括零膨脹負二項迴歸（zero-inflated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簡稱 ZINB）、零膨脹卜瓦松迴歸（zero-inflated Poisson regression，簡稱 ZIP）等；基本上採零膨脹分配的模型皆是一種混合模型（mixture model），也就是在原機率分配外再納入一個“零”點發生的伯努力分佈（Bernoulli distribution）。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 Allison（2012）、Hilbe（2014）等關於這類模型的討論。

14 此模型服膺的零膨脹廣義卜瓦松分配（zero-inflated generalized Poisson distribution）是由 Gupta et al.（1996）提出，咸認比一般零膨脹分配更具彈性。而 Famoye and Singh（2006）除顯示一般零膨脹分配模型的估算問題外，更比較出 ZIGP 模型在處理高比例零值的計數資料上是較好的選擇。不過跟所有零膨脹模型一樣，ZIGP 模型也是一種混合模型，需同時納入“零”點發生的機率分佈，使得最大概似法的估算過程更加複雜。為簡化分析模式，本文 ZIGP 模型的零膨脹程式（inflate equation）採截距項限制式，據以與其他模型比較超出零以外的次數。

表 3：排除捐款後實際現身參與反貪倒扁活動之分析

	NBR 模型	GPR 模型	ZIGP 模型 ²
	β (S.E.)	β (S.E.)	β (S.E.)
GRIVE	0.632 (0.505)	0.622 (0.504)	0.598 (0.508)
DPPID	-1.126 (0.512)*	-1.124 (0.508)*	-0.994 (0.520)
NOPID	-1.187 (0.487)*	-1.191 (0.484)*	-1.232 (0.528)*
TAIID	-0.152 (0.159)	-0.154 (0.158)	-0.188 (0.162)
GRIVE × DPPID	0.728 (0.741)	0.742 (0.737)	0.543 (0.741)
GRIVE × NOPID	0.708 (0.592)	0.727 (0.591)	0.619 (0.648)
GRIVE × TAIID	0.010 (0.187)	0.011 (0.187)	0.054 (0.191)
POLEF	0.358 (0.154)*	0.353 (0.154)*	0.401 (0.159)*
DISTA	-1.314 (0.277)**	-1.312 (0.275)**	-1.296 (0.278)**
AGELG	-0.062 (0.343)	-0.065 (0.343)	-0.027 (0.316)
EDUCA	0.031 (0.050)	0.030 (0.051)	0.044 (0.045)
INCOM	0.040 (0.043)	0.040 (0.043)	0.040 (0.039)
MAINL	0.422 (0.244)	0.420 (0.244)	0.385 (0.240)
CONS_	-1.788 (1.567)	-1.755 (1.566)	-1.467 (1.486)
α/δ	2.221 (0.663)**	0.933 (0.273)**	0.148 (0.067)*
N	1197	1197	1197
Log likelihood	-330.99	-332.03	-326.23
Chi ²	139.52	93.30	145.59
Prob > Chi ²	0.00	0.00	0.00

註 1：括號內的數值為標準誤 (standard error)，* $p < 0.05$ ，** $p < 0.01$ 。

註 2：模型的零膨脹程式 (inflate equation) 採簡化的截距項限制式。

就各項影響係數結果來看，與表 2 相較不難發現極大的變化。首先，對扁的不滿與怨懟不僅無法直接構成行動效果，原本會對藍綠陣營支持者及不同族群認同者造成的間接影響力，在排除捐款後也已無法有效鼓舞這類群眾去參與街頭抗爭。換個角度來看，原先以為不滿情緒應該有助於鼓動不同政黨、族群支持者現身支持倒扁，但最終並未如怨懟理論預期般的發生，證明該理論在解釋實質抗爭行動上力有未逮。

其次，傳統政治行為的概念與架構在此也證實無法完全解釋這種特殊、非典型的政治行動，除政黨認同之外，不論是受訪者的族群意識或省籍皆未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這些過往經驗裡被認為應該會現身支持的群眾，在面對街頭抗爭時並不如想像中的容易動員。至於國民黨認同者雖看似較傾向參與反扁抗爭，但總體來說政黨認同的影響力在此恐不宜過度解釋，這可從以下三個統計結果窺知：第一、若將模型政黨認同的基本類別（base category）換成獨立選民，此時表 3 的 DPPID 係數及標準誤在三個模型分別變為 0.062 (0.590)、0.067 (0.587)、和 0.238 (0.631)，皆未達統計水準的效果，顯示民進黨認同者參與倒扁的狀況與一般獨立選民無異，也就是民進黨支持者並沒有較獨立選民不願意站出來反對同黨的阿扁。第二、政黨認同的交叉項未呈現顯著性，顯見各個政黨支持者都不因怨懟情緒而改變參不參與抗爭的決定；換個角度來看，這也意指怨懟情緒對不同政黨支持者的影響效果相當一致，沒有因為不同藍綠政黨色彩而有不同影響。由此也可知，政黨認同並未呈現傳統政治上涇渭分明的狀況。第三、即便國民黨認同者看似比其他兩類群眾較傾向參與抗爭，但這結果並不一致，特別是 ZIGP 模型顯示民進黨認同者參與抗爭的情況跟國民黨認同者並無不同，更驗證傳統上藍綠之間大相逕庭的政治態度與立場，在這場倒扁運動中並未清楚呈現。從前述 ZIGP 模型與其他模型相較為佳的檢定結果來看，這項結論更不容輕忽。

改變抗爭內容後第三個主要發現，是諸多社會控制變數都無法有效詮釋參與抗爭的動機，不論是所屬世代、教育程度、所得水準，乃至於省籍，皆不會影響實際倒扁的抗爭行動。此一結果與表 2 迥異，從這些廣義資源動員變數的不顯著性來看，顯示資源動員理論無力解釋排除捐款後的反扁抗爭。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年紀變數雖不具統計水準，但它的影響方向是唯一在兩表中產生變化的，顯見只有將捐款採納為抗爭選項時，年長者的參與情況才會變得踴躍，但當抗爭是要真得上街拋頭露面時，仍是年紀較輕的民眾可以承擔這種高風險與成本的舉措。

最後也是表 3 最重要的發現，是理性選擇所提出的各項變數在此都獲得印證。首先，前述不顯著的怨懟情緒提供了理性選擇最關鍵的憑據，不論直接或間接都未對行動參與造成影響，需親上街頭的倒扁活動顯然躲不過民眾

搭便車的困境。至於兩個工具性誘因中，居住所在地造成的成本概念依舊顯著，以 ZIPG 模型的係數值的發生率比值來看，高雄市民參與抗爭的可能性比臺北市民低了 72.6% ($= (e^{-1.296} - 1) \times 100\%$)。更令人意外的是，政治效能感此時也轉變成符合理性選擇的期待，顯示政治功效意識較高者會更積極出面參與活動，可能性提升了 49.3% ($= (e^{0.401} - 1) \times 100\%$)。這兩個理性選擇工具變數的測量結果，提供了抗爭活動面對公共財問題時參與動機的解釋，也凸顯與行動目標無關的個人誘因，在詮釋集體行動上的重要性。總括來說，區隔出抗爭活動內容的廣義與狹義範圍後，明確指出當關注的焦點放在需民眾現身的抗爭活動時，第肆節提出的三項研究假設可說都獲得強力的支持。

捌、結語

2006 年訴諸反貪腐的紅衫軍倒扁運動，無疑是臺灣近代民主發展進程中一項令人矚目的群眾抗爭事件。雖然從運動本身目的性來看，逼迫陳水扁總統下台的訴求並未獲得實踐，但所提出的「反貪腐」、「超越藍綠對立」、「重構核心價值」等理念，對日後臺灣政治及公民社會發展的影響深遠，更被認為是促成二次政黨輪替的關鍵要素。為了一探運動的內涵與本質，本文摒棄傳統總體性、結構觀的研究思維，嘗試從參與抗爭者的角度出發，一窺民眾參與這場倒扁活動的背景緣由。而此一個體行爲研究的模式，也正符合 McAdam (1988: 127) 所提的概念：「社會運動雖是在總體脈絡 (macro context) 底下發生，但其實質的產生卻當是一個明確、動態特性的個體層次 (micro level) 的操作過程。」

不囿限於從傳統政治行爲的角度來闡述抗爭，本文回歸到非典型政治行爲理論的範疇，歸納出怨懟理論、資源動員理論及理性選擇理論等三大學派，並依相關學理建構統計模型的變數。透過 TEDS 提供的活動相關調查資料，輔以多個適當的計數資料迴歸分析，針對這場反扁運動可歸納出兩個主要的結論：

其一，若以純粹上街頭的抗爭做觀察，也就是依 Barnes et al. (1979) 所歸類的一般非典型政治行爲來看，不論本土意識的高低，也不論何種世代、

教育水準、所得水準，抑或是哪一個族群，皆不會實質影響民眾決定現身倒扁。至於政黨認同雖產生一些作用，但沒有呈現傳統政治行為時的方向感與作用力；亦即綠營支持者參與狀況不僅無異於中立的獨立選民，甚至與藍營支持者的差別也不一定顯著，顯示與臺灣政壇任何議題都黨同伐異的傳統大相逕庭。總括來看，理性選擇可謂解釋民眾願意拋頭露面最關鍵的理論思維，除了參與成本與預期的表達效益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外，更重要的發現是，即使內心怨扁的民眾也無法被有效動員，顯示抗爭活動的公共財困境明顯存在。

其次，若廣泛的將當年廣受矚目的百元捐款活動也視為抗爭的一部分，則結果又大不相同。理性選擇依據公共財概念所提供的解釋力大幅降低，反觀國民黨認同者、本土意識偏低、年齡較大、教育程度越高、外省籍等特性的群眾，參與活動的可能性都明顯提升。比較上述的差異不難發現，當年這項運動之所以能夠聲勢浩大地引領風潮，部分原因可能得歸功於主事者號召百元認捐的策略，因捐款的低成本、低風險本質，與一般高風險、高成本的街頭抗爭明顯不同，反倒降低了怨扁民眾搭便車的窘境。

近年來各式抗命、抗爭、維權等運動在華人社會風起雲湧，如2011年中國各地效法北非的茉莉花運動、2014年不滿服貿協定引爆臺灣大學生佔領立法院的太陽花運動、同年底香港因特首直選問題引發的佔中運動等，都在全球各地引爆高度的關注。這不僅顯示非典型的政治參與形式在現實生活中日趨普遍，也凸顯後續相關學術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本文以時過境遷已經較不敏感的紅衫軍運動為背景，期盼可以儘量客觀地從中探索民眾參與這類集體性運動的邏輯性。誠然本文的推論無法一體適用於理解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型態、不同議題，乃至不同群體的抗爭全貌，但希冀本文能有拋磚引玉之效，期待後續有更多專精學者與更豐富的數據資料可以一起投注到這項課題。

附錄一：TEDS 2006C 相關問卷設計

參與抗爭活動

- I4 施明德等人在去年九月間發起的「紅衫軍反貪倒扁運動」，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運動？
01. 非常同意 02. 同意 03. 不同意 04. 非常不同意
- I5 在這段期間，請問您有沒有去參加下列活動（可複選）？
01. 捐錢 02. 穿紅衣 03. 靜坐 04. 九一五圍城
05. 十月十日天下圍攻 06. 遍地開花 07. 沒有

怨懟情緒

- E1a 我們一樣想用 0 分到 10 分來知道您對一些政治人物的喜歡程度。非常喜歡是 10 分，非常不喜歡是 0 分，普通是 5 分。請問您會給陳水扁幾分？
- I2 整體來說，請問您認為陳水扁是清廉還是不清廉？
01. 非常清廉 02. 還算清廉 03. 不太清廉 04. 非常不清廉

政黨認同

- L2 目前國內有幾個主要政黨，包括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新黨，以及臺灣團結聯盟，請問您有沒有偏向哪一個政黨？
01. 有 02. 沒有
- L2a 那相對來說，請問您有沒有稍微偏向哪一個政黨？
01. 有 02. 沒有
- L2b 請問是哪一個政黨？
01. 國民黨 02. 民進黨 03. 新黨 04. 親民黨 05. 臺灣團結聯盟
06. 其他（請註明）

臺灣人認同感

- J2 有人說「臺灣人不是中國人」，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01. 非常同意 02. 同意 03. 不同意 04. 非常不同意
- J3 有人說「中國是中國，臺灣是臺灣，我們臺灣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01. 非常同意 02. 同意 03. 不同意 04. 非常不同意

政治效能感

- C1 我們一般民眾對政府的作為，沒有任何影響力。
01. 非常同意 02. 同意 03. 不同意 04. 非常不同意
- C2 政府官員不會在乎我們一般民眾的想法。
01. 非常同意 02. 同意 03. 不同意 04. 非常不同意
- C3 政治有時候太複雜了，所以我們一般民眾實在搞不懂。
01. 非常同意 02. 同意 03. 不同意 04. 非常不同意

年齡

- N1 請問您是民國幾年出生的？

教育程度

- N6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什麼（您讀到什麼學校）？
01. 不識字 02. 識字但未入學 03. 小學肄業 04. 小學畢業
05. 國、初中肄業 06. 國、初中畢業 07. 高中、職肄業
08. 高中、職畢業 09. 專科肄業 10. 專科畢業 11. 大學肄業
12. 大學畢業 13. 研究所肄業 14. 研究所畢業

收入水準

- N14 請問您家庭每個月總收入大約是：（包括薪資以外的其他收入，如房租、股利等等）
01. 25,000 元以下 02. 25,001 元～36,000 元 03. 36,001 元～45,000 元

04. 45,001 元～54,000 元 05. 54,001 元～62,000 元
06. 62,001 元～72,000 元 07. 72,001 元～84,000 元
08. 84,001 元～101,000 元 09. 101,001 元～132,000 元
10. 132,001 元以上

省籍

- N2 請問您的父親是本省客家人、本省閩南人、大陸各省市人，還是原住民？
01. 本省客家人 02. 本省閩南人 03. 大陸各省市 04. 原住民
- N3 請問您的母親是本省客家人、本省閩南人、大陸各省市人，還是原住民？
01. 本省客家人 02. 本省閩南人 03. 大陸各省市 04. 原住民

附錄二： 變數之相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s）矩陣

	COUNT	GRIVE	DPPID	KMTID	TAIID	POLEF	DISTA	AGELG	EDUCA	INCOM	MAINL
COUNT	1.000										
GRIVE	0.316 (0.00)	1.000									
DPPID	-0.225 (0.00)	-0.607 (0.00)	1.000								
KMTID	0.279 (0.00)	0.524 (0.00)	-0.554 (0.00)	1.000							
TAIID	-0.273 (0.00)	-0.531 (0.00)	0.465 (0.00)	-0.407 (0.00)	1.000						
POLEF	0.118 (0.00)	0.274 (0.00)	-0.179 (0.00)	0.123 (0.00)	-0.155 (0.00)	1.000					
DISTA	-0.196 (0.00)	-0.117 (0.00)	0.027 (0.00)	-0.083 (0.00)	0.105 (0.00)	0.026 (0.45)	1.000				
AGELG	0.073 (0.00)	-0.081 (0.00)	0.001 (0.55)	0.015 (0.16)	-0.025 (0.23)	0.032 (0.09)	0.024 (0.45)	1.000			
EDUCA	0.145 (0.00)	0.207 (0.00)	-0.108 (0.00)	0.103 (0.00)	-0.082 (0.00)	-0.155 (0.00)	-0.142 (0.00)	-0.425 (0.00)	1.000		
INCOM	0.089 (0.00)	0.060 (0.00)	0.023 (0.28)	0.045 (0.00)	0.026 (0.55)	-0.114 (0.00)	-0.187 (0.00)	-0.181 (0.00)	0.434 (0.00)	1.000	
MAINL	0.267 (0.00)	0.322 (0.00)	-0.270 (0.00)	0.301 (0.00)	-0.295 (0.00)	0.098 (0.00)	-0.107 (0.00)	0.059 (0.03)	0.114 (0.00)	-0.013 (0.40)	1.000

註：括弧內顯示相關係數之顯著水準（significant level）。

參考資料

A. 中文部分

TEDS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2006-2007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14年11月15日，取自 <http://www.tedsnet.org> (TEDS, 2006-2007,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Retrieved November 15, 2014, from <http://www.tedsnet.org>)

王鼎銘

2007 〈成本效益、公民責任與政治參與：2004年公民投票的分析〉，《東吳政治學報》25(1): 1-38。(Wang, Ding-ming, 2007, "Cost Benefit, Civic Du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Referendum in 2004,"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1): 1-38.)

江宜樺

2006 〈反貪運動確立基本政治價值〉。中國時報，12月29日，A19版。(Jiang, Yi-huah, 2006, "The Political Value Founded in the Anti-corruption Movement," *China Times*, December 29, p. A19.)

自由時報

2006 〈馬：和平靜坐才是保障對象〉。2014年11月15日，取自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sep/9/today-p1.htm> (Liberty Times, 2006, "Ma Ying-jeou: Peaceful Protest Is What We Protect," Retrieved November 15, 2014, from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sep/9/today-p1.htm>)

張福建 (主編)

2009 《公民與政治行動：實證與規範之間的對話》。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Chag, Fu-kien (ed.), 2009, *Citizenship and Political Action: A Dialogue between Empirical Inquiries and Normative Reflections*. Taipei: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盛杏媛、鄭夙芬

2009 〈台灣民眾的藍綠認同與紅衫軍運動的參與：一個框架結盟的解釋〉，見張福建 (主編)，《公民與政治行動：實證與規範之間的對話》，頁131-182。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Sheng, Shing-yuan and Su-feng Cheng, 2009, "Taiwanese Blue-Green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Redshirts Protest: An Exploration of the Frame Alignment," pp. 131-182 in Fu-kien Chang (ed.), *Citizenship and Political Action: A Dialogue between Empirical Inquiries and Normative Reflections*. Taipei: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陳陸輝

2009 〈信任、效能與行動：解析民眾為何支持紅衫軍或挺扁活動〉，見張福建 (主編)，《公民與政治行動：實證與規範之間的對話》，頁183-214。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Chen, Lu-huei, 2009, "Trust, Efficacy, and Action: Explaining Why Citizens Support Red-shirt Army or Support President Chen," pp. 183-214 in Fu-kien Chang (ed.), *Citizenship and Political Action: A Dialogue between Empirical Inquiries*

and Normative Reflections. Taipei: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廖元豪

2006 〈反貪腐如何成爲公民運動〉，見楊渡（主編），《紅花雨》，頁 201-206。臺北：南方家園文化事業公司。(Liao, Yuan-hao, 2006, "How the Anti-corruption Becomes a Social Movement," pp. 201-206 in Du Yang (ed.), *Red Flower Rain*. Taipei: Homeward Publishing.)

趙剛

2006 〈希望之苗：反思反貪倒扁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4: 219-265。(Chao, Kang, 2006, "The Germ of Hope: Reflections on the Anti-Corruption and Anti-Chen Campaig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cience* 64: 219-265.)

蔡佳泓

2008 〈反貪倒扁運動的支持度之多層次貝式定理分析〉，《政治學報》45: 67-93。(Tsai, Chia-hung, 2008, "Multi-level Bayesian Analysis of the Supporting Rate of the Anti-Chen Rally,"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5: 67-93.)

B. 外文部分

Agresti, A.

2007 *An Introduction to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Sons.

Allison, P. D.

2012 *Logistic Regression Using SA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Cary, NC: SAS Inc.

Barnes, S. H., M. Kaase, Klaus R. Allerback, Barbara Farah, Felix Heunks, Ronald Inglehart, M. Kent Jennings, Hans D. Klingemann, Alan Marsh, and Leopold Rosenmayr

1979 *Political Action: 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

Bean, C.

1991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Protest: A Causal Model with Australian Evidence," *Political Behavior* 13(3): 253-283.

Booth, J. and M. Seligson

2009 *The Legitimacy Puzzle in Latin America: Political Support and Democracy in Eight N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schken, H. L.

1975 "The Logic of Protest Action,"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28(1): 59-71.

Bratton, M., R. Mattes, and E. Gyimah-Boadi

2005 *Public Opinion, Democracy, and Market Reform in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eron, A. C. and P. K. Trivedi

1998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unt Data*.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pbell, A., P. E. Converse, W. E. Miller, and 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Canache, D.

1996 "Looking out My Back Door: The Neighborhood Contexts and Perceptions of

- Relative Deprivat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49(3): 547-571.
- Consul, P. C.
1989 *Generalized Poisson Distribution: 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Marcel Dekker Inc.
- Consul, P. C. and G. C. Jain
1970 “On the Generalization of Poisson Distribution,” *Annal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41(4): 1387.
- Dalton, R., A. V. Sickle, and S. Weldon
2010 “The Individual-Institutional Nexus of Protest Behavio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0(1): 51-73.
- DeMaris, A.
2004 *Regression with Social Data: Modeling Continuous and Limited Response Variables*.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 Famoye, F. and K. P. Singh
2003 “On Inflated Generalized Poisson Regression Models,” *Advances and Applications in Statistics* 3(2): 145-158.
2006 “Zero-Inflated Generalized Poisson Regression Model with an Application to Domestic Violence Data,” *Journal of Data Science* 4: 117-130.
- Finkel, S. E., E. N. Muller, and K. Opp
1989 “Personal Influence, Collective Rationality, and Mass Political Ac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3(3): 885-903.
- Finkel, S. E. and E. N. Muller
1998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Dynamics of Collective Political Action: Evaluating Alternative Models with Panel Data,”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1): 37-49.
- Finkel, S. E. and K. Opp
1991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Political Ac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3(2): 339-371.
- Francisco, R. A.
1993 “Theories of Protest and the Revolutions of 1989,”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3): 663-680.
- Gamson, W.
1975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Homewood, IL: Dorsey Press.
- Gibson, M.
1991 “Public Goods, Alienation, and Political Protest: The Sanctuary Movement as a Test of the Public Good Models of Collective Rebellious Behavior,” *Political Psychology* 12(4): 623-651.
- Grumu, S. and P. K. Trivedi
1996 “Excess Zeros in Count Models for Recreational Trip,”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14(4): 469-477.
- Gupta, P. L., R. C. Gupta, and R. C. Tripathi
1996 “Analysis of Zero-adjusted Counted Data,”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and Data*

- Analysis* 23(2): 207-218.
- Gurr, T. R.
1970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ilbe, J. M.
2011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Modeling Count Dat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gg, R. V. and A. T. Graig
1995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Inglehart, R.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aveline, D.
2003 "The Role of Blame in Collective Action: Evidence from Russia,"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1): 107-121.
- Jenkins, J. C.
1983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 527-553.
- Kim, Q.
1996 "From Protest to Change of Regime: The 4-19 Revolt and the Fall of the Rhee Regime in South Korea," *Social Forces* 74(4): 1179-1208.
- Klandermans, B.
1984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Social-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s of Mobilization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5): 583-600.
- Kornhauser, W.
1959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Glencoe, IL: Free Press.
- Kritzer, H. M.
1979 "A Theory of Unconventional Political Action: The Dynamic Confrontation," pp. 109-132 in M. Hoefnagels (ed.), *Repression and Repressive Violence*. Amsterdam: Swets and Zeitlinger.
- Long, S.
1997 *Regression Models for Categorical and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Loveman, M.
1998 "High-risk Collective Action: Defending Human Rights in Chile, Uruguay, and Argentin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2): 477-525.
- McAdam, D.
1988 "Micromobilization Contexts and Recruitment to Activism,"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1: 125-154.
- McDonough, P., D. C. Shin, and J. Moisés
1998 "Democrat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Comparing Spain, Brazil, and Kore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0(4): 919-953.

- Meyer, D.
2004 "Protest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0: 125-145.
- Mullahy, J.
1986 "Specification and Testing of Some Modified Count Data Model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33(3): 341-365.
- Muller, E. N. and K. Opp
1986 "Rational Choice and Rebellious Collective Ac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2): 471-488.
- Muller, E. N. and T. O. Jukam
1983 "Discontent and Aggress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3(2): 159-179.
- Muller, E., T. O. Jukam, and M. Seligson
1982 "Diffuse Political Support and Antisystem Political Behavio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6(2): 240-264.
- Oberschall, A.
1973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pp, K.
1990 "Postmaterialism,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al Protes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4(1): 212-235.
- Opp, K. and W. Roehl
1990 "Repression, Micro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Protest," *Social Forces* 69(2): 521-547.
- Riker, W. H. and P. C. Ordeshook
1968 "A Theory of the Calculus of Voting,"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1): 25-42.
- Scott, James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ullock, G.
1971 "The Paradox of Revolution," *Public Choice* 11: 89-99.
- Verba, S., K. L. Schlozman, and H. E. Brady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ikipedia
2014 "Million Voices Against Corruption, President Chen Must Go," Retrieved November 15, 2014,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llion_Voices_Against_Corruption,_President_Chen_Must_Go
- Winkelmann, R.
2000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ount Data*. Berlin, NY: Springe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Protesting: A Rational Choice Analysis of the Anti-Chen Movement

Ding-ming W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Protesting, unlike voting behavior, is a sort of nontraditional or unorthodox political behavior. There are three distinct theories explaining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is action: Grievance Theory,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nd Rational Choice Theory. By estimating several count data regressions, this paper found many explanations for the reasons people joined the Anti-Chen Movement in 2006. First, it is not sufficient to explain this movement, especially those actions requiring people to take to the streets, through traditional voting perspectives such as party identification, race/group ideology, or provincialism. Secondly, of those three theories, only Rational Choice provided enough support to clarify the public good dilemma in this action. Thirdly, the reason this movement engendered so many followers and avoided the free rider problem is attributed to the NT\$100 fund-raising activity. It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risk and cost of joining the protest action.

Key Words: anti-Chen movement, protesting behavior, public good, free rider, count data modeling